

群星灿烂

——现当代宁波籍名人 中

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宁波出版社

宁波文史资料第 23 辑

群星灿烂

——现当代宁波籍名人(中)

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宁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星灿烂：现当代宁波籍名人/宁波市政协文史委编.
宁波：宁波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2-609-6/K·46

I.群... II.宁... III.名人-生平事迹-宁波市-现代
IV.K820.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624 号

群星灿烂

——现当代宁波籍名人

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书版发行：宁波出版社(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责任编辑：李振声 黄炳辉 王晓舜

封面设计：王海明

印 刷：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6.5

字 数：545 千

版 次：2003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602-609-6/K·46

定 价：全套(3 册)75.00 元

总 编： 洪钧杰

顾 问： 王永杰

副 总 编： 黄炳辉 戴光宗 王晓舜

中卷·商海巨子

主 编： 戴光宗

副 主 编： 张 萍

执行编辑： 黄炳辉 王晓舜

编 辑： 朱 炜

政协第十一届宁波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洪钧杰

副 主 任：黄炳辉 杨明祥 许孟光 李振声
张启海 裘成源 蔡国黄 戴光宗

委 员：牛笑风 张 弛 张 萍 张建明
陈依元 俞 晓 费国良 贺雪飞
姚志明 屠文淑 虞浩旭

特 邀 委 员：史小华 宋静之 袁元龙 徐良骥
裴明海

文 史 办 主 任：王晓舜

序

王卓辉

宁波,面对浩瀚大海,背枕四明群山。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厚重的七千年文化积淀,造就了好学善思、勤劳聪慧的宁波人,诚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19世纪中叶以降,宁波前承浙东学派“工商皆本”思想之启蒙,后值欧风东渐催发现代经济之萌芽,更逢革命浪潮席卷东海之畔,故而得风气之先的现当代宁波,英才辈出,名人迭现。

5年前,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秉持“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之宗旨,精心挑选从四明大地走向全国,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声名显赫的宁波籍“商海巨子”、“政坛名人”、“文化群星”60余人,编辑出版了《宁波文史系列丛书》三辑,颇得好评。而今,文史委同仁和一批专家学者历经5年之努力,50余万言的《群星灿烂——现当代宁波籍名人》又呈献于读者诸君面前。本辑史料与《宁波文史系列丛书》相衔接,体例上萧规曹随,分成政治、经济、文化三卷。收录的48位甬籍名人事迹,充分展示了20世纪中后期宁波籍杰出人物的奋斗历程和卓越成就。

经史料作者尽心竭力的搜寻，较为详实客观的描述，使书中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他们中有叱咤风云、浴血疆场、“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魔王让寸分”的革命先辈；有诚信为本、闯荡世界、长袖善舞、坚忍不拔的鸿商巨贾；有寒窗苦读、深钻细研、出类拔萃、卓有建树的教育科技文化名人。他们是宁波人中的佼佼者，令家乡人民为之自豪。

当今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涌动，开拓创新意气风发。我们作为宁波之后人，当乘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之东风，以先辈为榜样，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抢抓机遇，奋发图强，进一步加快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共同创造宁波更加美好的未来。

是为序，以此庆贺《群星灿烂——现当代宁波籍名人》一书的出版发行。

2002年12月

目 录

序

王卓辉(1)

中卷·商海巨子

声誉东瀛的“鱼翅大王”

——记北海道旅日侨商领袖张尊三 陆志濂(1)

抱济世热忱 奋海外事业

——记爱国侨商吴锦堂 周乃复(11)

华夏英杰 爱国楷模

——记香港著名爱国工商巨子王宽诚 张建明(31)

影视巨头 慈善仁翁

——记邵逸夫爵士 黄炳辉(51)

使中国航运业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记“现代郑和”董浩云 张 萍(72)

享誉世界的“春卷大王”

——丹麦华人协会终身名誉会长范岁久

戴光中 沈 进(93)

水泥巨子 公益善翁

——记台湾嘉新集团创始人张敏钰 戴光中(108)

跻身于美国华人十大财团

——记美国大中集团创办人应行久 陆志濂(125)

商界奇才 棋坛祭酒

——台湾应氏企业创始人应昌期 李建树(137)

从银行家到航运家

——包玉刚传略节选 王耀成(155)

希望工程的“超级富豪”

——记浙江省爱乡楷模赵安中 张 萍(171)

回馈乡亲 造福桑梓

——记台湾化工巨子朱绣山
陈厥祥 卢美芬(189)

生财有道 行善无痕

——记香港棉纱大王陈廷骅
卢美芬 陈厥祥(199)

光耀星河 彪炳华夏

——记著名爱国实业家曹光彪 冯 骏(212)

地产大王 湾区首富

——美国华商总会首任会长张济民 戴光中(233)

真诚奉献 造福社会

——记宁波市荣誉市民李达三 许雍章(247)

心,为故土跳动

——记旅德宁波同乡会理事长陈名豪
蔡国黄 应建芬(253)

后 记

编 者(265)

声誉东瀛的“鱼翅大王”

——记北海道旅日侨商领袖张尊三

陆志谦

张尊三，字安澜，堂名贵溶，浙江省宁波鄞县人，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生，自幼好学，15岁时学习制茶业，1865年，任职于宁波江北岸广捐局。1870年7月，东渡日本，在北海道函馆市旅日华商开设的万顺号任账房。

函馆位于日本北海道西南部、渡岛半岛南岸，临津轻海峡，西南有函馆山。当时的日本，被美国海军强迫打开门户之后，农民逐渐丧失土地，手工业工人破产失业，所以民间排外情绪非常高涨，即使对待华商，亦视为企图剥夺当地日本民众生计的入侵者，排斥心理非常严重。来到这样一片遥远、陌生的异国土地上，没有他平时听惯的乡音，接触到的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庞，流露出敌视的目光……一切的一切，使张尊三当时心灵上要承受极大的压力。但是，他是抱着希望去的，要去创业。他深信在这种环境下，只有忍耐，坚韧不拔，熟悉环境，才能逐步改变当地民众对他的看法。他在侨商开设的万顺海产号（后在公泰号）任账房时，除平日尽力熟悉海味业业务外，还考察商情，了解周围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等。

张尊三经过9年的努力，至1879年（日本明治十二年），才在函馆独资开设了一家德新海产号，后改组为裕

源成号。同年,在上海设元记字号,位于南市永安街上,张尊三在函馆主持进货事宜,上海元记字号则由朱安山任经理负责销货。由于货源由日本中间商提供,因此增加了进货成本,张尊三为了摆脱他们的控制和剥削,疏通进货渠道,扩大收购货源的范围,就与当地海产品侨商潘延初一道,深入到偏僻荒凉的北海道沿海一带,对产地及海产品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他们操着不很熟练的日语和手势,与当地渔民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和接触,终于在岩内附近发现一种被丢弃的小鲨鱼鳍,堆积如山。此地的日本渔民,一直把它当作毫无利用价值的废物丢弃,张尊三看到后,却大喜过望,如获至宝。

据上海海关关册记载,鱼翅早已有进口记录。原来,当时的上海餐饮业,有专门供应所谓“上流社会”人物的餐馆,也有众多的适合大众社会人民的饭店。餐馆用的鲨鱼翅是整张的,叫做“排翅”;而饭店用的小鲨鱼翅叫做“散翅”。张尊三在日本岩内附近发现的被废弃的小鱼翅,加工后便可以制作成“散翅”,因价格低廉,很适合大众社会饭馆食客的需要。

于是,张尊三告诉当地渔民,他愿意出价收购这些废弃物,并教给他们如何加工利用的方法。渔民们虽将信将疑,但愿意如法炮制。张尊三信守诺言,作价收购。此事一经传开,渔民们也纷纷乐意加工,要求张尊三收购。他的货源顿时大增,而且价廉物美,将货装运到上海销售后,深受中低阶层消费者的欢迎。

张尊三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进产品的精选、干燥和包装等各个环节的制作工艺,使鱼翅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销售量也直线上升。且因货源渠道摆脱了日本中间

商的剥削,成本降低,直接增强了产品在上海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这一新的发现,使张尊三彻底摆脱了创业初期在精神和物质上的阴影,他憧憬的事业呈现出一片辉煌的前景。同时,此举也促成了北海道西海岸日本渔民一项意想不到的新的经济收入。他在函馆声誉鹊起,也大大改善了和当地日本人民的关系。

函馆的旅日华商,曾于1877年建立“中华义塚”台町墓地和“同德堂”。1902年(日本明治三十五年)同德堂买下函馆富冈町三番地的木结构建筑洋楼4幢,办妥房屋所有权保存登记,并在这里成立同德堂三江公所,公举张尊三为同德堂三江公所董事,潘延初为副董事。

所谓三江公所,泛指来自中国内地浙江、江苏、江西三省的华侨,统称“三江”。近代东渡日本的华侨,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大多是福建、广东、浙江、江苏、江西籍的人士,而当时函馆的侨商则以三江居多,成立同乡会馆,是为了在异乡客地团结互助,求得生存和发展。但是1877年成立“同德堂”组织,后来为争夺商业利益,内部逐渐形成了帮派,经常相互倾轧,结果反而给日本商人以可乘之机,不但削弱了华侨的力量,还往往让日本人瞧不起。具有强烈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的张尊三目睹这一切,心情十分沉重。他深切地知道,在异乡客地,在日本人面前,这种“窝里斗”不仅会影响华商贸易在当地的正常发展,而且有损于祖国的形象、民族的尊严。因此,他于1885年起被推举为华商董事后,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经过他在侨胞中的斡旋、调解和晓以大义,终于使那种水火不容、豆萁相煎的局面改变过来。随后,在他的倡议和资助下,组织同行业于

1902年购入洋式建筑4栋,在同德堂原有的基础上,创办了“同德堂三江公所”,作为华商同业集会议事的场所,张尊三被公举为第一任董事。三江公所的建立,加强了旅日华商间的联系和交流,打破了狭隘的帮派观念和势力,促进了旅日华商相互间的团结,也维护和增强了华商自身的利益和力量。

1907年8月,函馆发生火灾,烧毁房屋390幢,同德堂三江公所亦被毁,在张尊三、潘延初等的劝募下,于1909年(日本明治四十二年)6月重建,更名为“中华会馆”,并举行奠基典礼,次年12月9日,函馆中华会馆举行竣工开馆典礼。中华会馆的设计、施工监督朱英及雕刻师、漆工等15人都从宁波请去,耗工费2万日元。馆内全部按照中国清代末期建筑风格设计,供奉关帝,所以又称关帝庙,是华商议事之所。函馆中华会馆的建立,标志着北海道桦太地区在日华商组织的大团结。中华会馆迄今对公众开放,是经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惟一完整保存下来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清代建筑物。同年9月,函馆区公会堂又竣工,“兰亭”中华料理店开业,在函馆的华商人数1879年为23人,1886年为44人,至1906年为76人,1912年(日本大正元年)则已增加到142人。

张尊三有五子三女,在他的扶持下,子婿们都纷纷在函馆、上海两地开设经营海产品的字号,掌握函馆和上海两头的经销。次子芷芳开设惠昌海味号,三子峻卿是上海同康海味号函馆支店经理。张氏家族开设的9家字号虽然各自经营,但都是联合的,装运海产品至上海时,向日本轮船公司包租一艘总吨位约在3千吨左右的货船,直接驶往上海,上海又有9家各自的字号(东洋

庄),拥有来自全国各地一帮客户,总共往来客户不少于100多家,来货一到沪,就销售给各东洋庄海味批发行。张氏家族联号对往来客户只有一句话:与张氏联号了,就不能与日本洋行发生交易往来,否则一旦查实,就不再与这家客户交易了。因此,本外地这100多家往来客户都集中在张氏家族9家联号的手里,结成一张牢固的“海底篱笆”,垄断了函馆海产品的销售渠道。日本洋行在上海的支店明明知道张氏联号垄断了销售,但也奈何他们不得。

张氏家族联号所以能获得本外地经营东洋海货行家的拥护,愿意与他们建立买卖关系,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譬如:产品质量保证。如海带是北海道一项主要海产品,原先日商经营海带不经选择,优劣不分,统货统价,往往把霉烂变质的掺杂在内。而张氏联号在函馆进货时,张尊三亲自主持,严格把住质量关,将统货分门别类,按质论价,还改进包装,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受损,所以行销我国市场后,销量大增。海带含碘,当时民间盛传食用之后可以避免瘴气,仅海带一项产品,就成为上海元记号东洋庄所经营的大宗产品之一,又为上海元记联号震康字号东洋庄经营的三瑞牌商标海带,规格全,质量高,享有美誉。其二:在函馆设有同德堂三江公所及中华会馆同业公会等组织外,在上海相应地也设有海味业东洋庄同业公会组织——集义公所,所址设在上海旧法租界打铁浜苏州会馆附近,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建成,凡在上海以经营日本函馆海产品输沪的函馆字号同业大抵加入,即使其他东洋庄字号兼做函馆来货的如鼎记字号(日本横滨海产字号)等亦许入会,每逢星期日聚

会一次,商讨业务情况,入会费银元200两,常年会费100两。同业如有来货,每件抽捐1分,作为公所之经费。集义公所备有天平秤多副,分存各洋栈,出货时,凡加入公所之同行,均可使用天平秤。

甲午前后,在日本函馆的东洋庄办庄一般在10家左右,1904年,有裕源成(张尊三)、慎昌荣(潘延初)、丰泰(张忠甫)、源泰永、裕泰、源茂成、四协和、慎记号、日新昌等9家,函馆属中国横滨领事馆管辖,为日本海产品产地和集散地,函馆华侨字号以收买各种海产品输入上海为主,在函馆设庄经营海产品的华侨,多数为浙江省宁波人,该埠海产以海带(昆布)、海参、鱼翅、干贝、虾米、鲍鱼等各种海产品为主,均以秋季为盛产之期,函馆华商主要业务是办理进货事宜,鉴别货物之优劣、分别等级、加工制作、精选包装,直至办理打包发运等一系列手续。

函馆同业公会组织——函馆的三江公所则不同于上海集义公所按同业来货件数抽捐,根据函馆三江公所保存下来的公所账册(总清),反映了当时对函馆华商征收厘捐的规定,三江公所收入除厘捐外,还有装运货物的日本邮船会社的回佣收入,以及募捐。日常的开支有:文具通信、交通、电灯、电话、办事人员薪给、伙食以及祭祀、宴会、抚恤、捐赠。

1915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让日本支持其复辟称帝,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协议,立即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和声讨,也激起了远在日本北海道函馆华商强烈的民族之愤。他们在侨领张尊三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拒收当地海产品,坚持抵货同盟。此时,在函馆

的华商经济实力相当雄厚,贸易的一半以上操纵在他们手里,足以左右北海道的经济命脉,他们团结一致,充分发挥自身的实力,不屈从于日本政府的施压和中日政治形势风云骤变。经过了三个月的斗争,终于在这年6月,迫使日方妥协,使加入组合问题得以解决。

1917年,张尊三的小女婿潘莲夫(函馆华侨同业中华会馆副理事潘延初之侄)也在张尊三的资助下,在函馆开设了义记海产号。这一年函馆华商共设有海产字号11家,其中张氏及其子婿等占近半数,这一时期为张尊三及其家族在函馆经营海产贸易的鼎盛时期;但同时亦逐渐形成了中日商人对峙的局面。经营日本海产品的货商东洋庄过去虽曾一度掌握着日本输出海产品贸易的控制权,但从此中日两国商人的争夺日趋白热化;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逐步深化,如以1916、1917两个年份上海从日本输入海产品的总值与中日商人经营比重估算,1916年,上海口岸从日本输入海产品为3,648千关两(按:1海关两折合1.558银元),日商经营海产品营业额估算1,354千关两,占总输入的37.12%;华商经营海产品的营业额估算为2,924千关两,占总输入的62.85%,上海华商营业额:厢馆字号为200万银元;其他字号为157.5万银元,1917年总输入为3,679千关两;其中日商为1,764千关两,占47.95%;华商为1,915千关两,占52.05%,其中上海厢馆字号营业额为195万元;其他字号为103.5万元(以上统计数字取材于:(1)上海口岸输入日本海产品,各根据该年海关关册综合;(2)函馆华商输出海产品值系根据兼代横滨总领事馆副领事江洪杰业务报告;(3)其他华商输入日本海产品值系根据神户领事稽镜商务报告

数字综合估算)。

上海经营日本海产的日本洋行有三井洋行、林仓洋行、吉田洋行、泰兴洋行、小幡洋行和日华洋行等,在日商洋行中以三井洋行为最大,三井是日本四大财阀之首,当然不甘于华商东洋庄长期把持海味贸易的经营权,就凭借它的实力和优势,积极破坏张氏家族和至亲至戚联合经营的销售网。它针对张氏家族关于“不得向洋行要货,否则取消客户关系”的规定,不惜工本大放盘,将海产品的价格跌至成本以内,拉拢客户上门。这样一来,就有贪图便宜货的批发商,悄悄地从三井洋行进货。此门一开,群相效尤,“海底篱笆”终于打开了缺口。

1916年(日本大正五年)2月,华商董事、中华民国领事代理张尊三归国,公会堂及中华会馆举行盛大的送别仪式,在送别会上,张尊三即席讲话说:“中日两国是近邻,对事物的看法、性格都有接近之处,加上交通运输工具的日趋发达,缩短了两国的距离,函馆的对华贸易今后将不断发展,目前日本出口还仅限于海产品,工业产品仍不景气,将来只要注意这方面……”在他离开侨居了40多年的日本函馆将回到祖国家乡宁波前,他将毕生经营的全部事业,委托给四子定卿与大女婿范友笙、小女婿潘莲夫,送别宴会由函馆政府长官和全市各界代表及海产同业等发起,到码头送行时有200余人,盛况空前,当年他72岁。

由于张尊三在促进中日贸易和为日本发展对华海产事业等方面的贡献,曾得到中日两国历届政府的嘉奖。1890年曾被清政府加捐候选同知四品衔;1891年被赐予盐运使头衔,辛亥革命后,曾任中华民国函馆领事